

# 国际视野下的幼儿园爱国主义教育路径研究

陈璐

## 一、幼儿园爱国主义教育路径的国际借鉴

爱国主义教育是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与国俱存的历史现象。本文选择芬兰、韩国、澳大利亚这三个国家的学前家国情怀和公民教育体系作为国际比较研究样本,三国分别代表不同的教育模式、文化背景和育人导向,样本差异大、参考价值高,可以很好地避免单一国家研究的片面性。

芬兰教育作为国际教育的标杆,对它的爱国主义教育优秀经验进行分析和借鉴,可以改善我国爱国主义教育的实践。韩国和我国都属于东亚儒家文化圈,有着相似的文化基础,教育环境相似度很高,其积极的教育实践给我国幼儿园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很高的参考价值。澳大利亚属于典型的多元文化移民国家,在多元文化冲击之下形成稳定的国民归属感,培养幼儿正确的文化认知和国家意识,创建起成熟的跨文化育人体系。目前我国正处在全球化多元文化交融的时代背景之下,同时也要面对本土文化认同与外来文化兼容的教育难题,澳大利亚的育人经验可以给我国幼儿园避免狭隘民族主义、培养幼儿开阔的国际视野、实现爱国主义教育与国际理解教育的融合提供重要的借鉴。

## 二、国际视野下幼儿园爱国主义教育目的

在芬兰的学前教育体系里,官方并没有对爱国主义教育做出明确化、口号化的表述。但是,在《全国幼儿教育保育国家核心课程大纲(2018)》这一核心育人纲领中提到“幼儿教育保育支持儿童扎根自身文化成长,帮助儿童珍视自身文化根基和多元文化。儿童逐渐建立起对于家庭、社区和社会的归属感,这是儿童文化身份和积极自我意识形成的基础。却用隐性的表述方式提到了培养幼儿文化根基认同、归属感等具体的爱国主义元素。

与芬兰教育中的“隐形”爱国主义词条不同的是,韩国官方直接设置了爱国主义的目的。

根据韩国教育部2019年最新修订的《NURI幼儿园国家课程标准》,幼儿园社会领域总目标是帮助幼儿正确认识自我与他人、家庭与社区、国家与世界,培养健康的社会态度和基础公民素养,珍视本国传统文化,尊重异域多元文化,形成开放包容的世界观。在《标准》中,“国家与文化认同”条目明确指出,认识并体验本国国家象征、传统文化和民俗生活,形成作为大韩民国国民的归属感和自豪感;理解并珍惜本国的历史和优秀文化,培养文化自信和家国认同的态度。

在澳大利亚联邦层面的学前教育核心法规中,“爱国主义”的字迹很难找到,也无法规定出专门、独立的“爱国主义教育”章节。虽然法律规章中没有出现“爱国教育”字样,但并不意味澳大利亚的学前教育阶段不进行爱国主义取向的教育。如澳大利亚联邦法律中规定,儿童归属感、身份认同、培养儿童对澳大利亚社会和文化有尊重的目的。澳大利亚政府委员会在2022年发布的《澳大利亚早期学习框架》中提出,在幼儿五大学习成果中,成果要求中有一条就是“强烈的身份认同感”目标。

## 三、国际视野下幼儿园爱国主义教育内容

芬兰学前教育体系没有显性的爱国主义教育课程、口号和意识形态宣传,它的学前家国情怀培育全部依靠生活化、文化化、价值化的隐性途径来完成,核心是用乡土认同、文化认同、国民价值认同代替传统的显性爱国主义教育,符合幼儿的认知规律,形成温和长效的国家归属感培育体系。按照全国幼儿教育和保育国家核心课程大纲(2018)官方育人要求以及芬兰学前教育实践,其幼儿园爱国主义教育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即本土乡土与生活归属教育、本土文化与民族精神教育、国民价值与多元包容教育。

根据韩国2019年最新修订的《NURI幼儿园国家课程标准》,社会领域被划分为国家符号

认知、本土民俗和生活文化教育、民族历史和文化优越性启蒙、国民身份归属这四个部分。其中国家符号认知上,带领幼儿认识国旗、国徽、国花、国庆等国家标志性的符号;本土民俗与生活文化教育主要包含了解韩国传统民俗文化、风土人情;民族历史与文化优越性启蒙部分重在引导幼儿对家国家历史的感知,从而激发幼儿的民族自豪感;国民身份归属部分重在培养大韩民国国民的共同体归属感、身份认同和家国情感。

澳大利亚联邦层面的学前教育核心法规和全国统一课程文件中,并没有使用“爱国主义教育”这个词,但是在公民身份、国家认同、文化归属和价值观念教育的名义下,隐含了大量的可以被视为“温和爱国主义”的内容,《澳大利亚早期教育学习框架》中提到的五个学习成果之一就是“强烈的身份认同感”,明确写到,“儿童建立对自己、家庭、社区、澳大利亚的归属感;理解自己是澳大利亚社会的一员;尊重原住民、托雷斯海峡岛民文化,走向和解。”

## 四、国际视野下幼儿园爱国主义教育方法

芬兰爱国主义教育渗透中表现出非口号化、非形式化的特征,主要以乡土认同为基础来奠定国家认同,用生活浸润代替理论灌输,因此在芬兰学前教育领域里,多以体验式了解民俗民情、感知文化多元、萌发幼儿归属感为主。同时芬兰以经典国民读物为主载体,把家国底色深深扎根进去。作为被世界公认为全球国民阅读素养最高的一国,芬兰用国民启蒙经典《我们的国土》等读物,以文本浸润的方式,用童趣化、生活化的叙事方式,描绘芬兰的山川地貌、本土民俗、国民生活和民族精神,不依靠宏大叙事,而是用乡土审美和生活共情,使幼儿产生对祖国的热爱和对家国的朴素情感。

韩国幼儿园爱国主义教育实践禁止说教式,在相关的法规中明确规定了以游戏化、生活化的形式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方法。同时提出通

过体验式、参与式的教学方式,使幼儿在走访家乡、制作传统手工作品、过节的过程中感受家国形象,产生家国情感。除此之外,在国际形势发生转变的时候,课程标准提出“教学要以本国文化为基础,然后引导幼儿去尊重其他国家的文化,不能出现崇外轻内的现象,从而解决国际化带来的本土认同弱化的问题。文件中提到爱国主义教育要和家庭、社区联动起来,利用本土社区文化场景、本土传统资源来开展家国文化浸润教育。

与芬兰爱国主义教育实践一样,澳大利亚的爱国实践也更倾向于“温和的隐性爱国主义”,即非强制性的做法,部分州对于爱国仪式的举办有着比较宽松的要求。在官方政府推荐的爱国主义教育建议里,大多数都用核心仪式,例如土地致敬、澳大利亚日、和解周等场合隐性地渗透爱国主义教育。话题讨论,例如:“我们是谁?生活在什么样的国家?”讨论等途径,促使幼儿产生公民意识。

## 五、国际视野下幼儿园爱国主义教育路径对我国的启示

本文从国际视野出发,对芬兰、韩国、澳大利亚三国学前教育体系中爱国主义教育的表达进行梳理,并对我国幼儿园开展高质量爱国主义教育提出思考和借鉴;应根据幼儿身心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确定不同的爱国主义教育目标。在教育内容选择上,应该大量挖掘幼儿生活中熟悉且具备爱国主义教育意义的具象符号融入日常生活,在教育方法的运用上应该摒弃形式化的说教,重体验、游戏、节日浸润等隐性爱国主义教育,把家国情怀落脚到幼儿可感知的日常情感上。

作者单位:赣南师范大学科技学院  
课题项目:江西省基础教育研究课题  
“幼儿园升旗仪式教育功能实践研究”(课题编号:SZUGKYJ2023-1134)。

# 陕甘宁边区民众教育的实践探索

苏佳一

陕甘宁边区民众教育是中国共产党开展群众教育的实践。边区通过建立民众教育馆、冬学和夜校等民众教育载体,确立了教育为抗战服务的导向以及完善师资、经费等保障机制,推动了民众教育的发展,对新时代开展基层教育提供了重要启示。

陕甘宁边区开展民众教育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陕甘宁边区是一块文化教育的荒地,学校稀少,文盲较多,“在某些县如盐池一百人中识字者有两人,再如华池等县则两百人中仅有一人。平均起来,识字的人只占全人口百分之一。至于小学,全边区过去也仅有一百二十个,并且主要是富有者的子弟。”这种文化落后的状况不仅影响民众生活水平的改善,制约边区生产力的发展,还不利于边区政权建设。因此,扫除文盲、提高边区人民的文化水平成为边区政府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1939年1月《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中指出要“发展民众教育,消灭文盲,提高边区成年人民之民族意识与政治文化水平。”边区政府认识到广大民众的力量,通过民众教育增强民众的公民意识,也为边区建设新民主主义政权奠定基础。

## 一、建立民众教育载体

民众教育馆是边区开展民众教育的重要据点,承担着消灭文盲的重任。边区政府十分重视民众教育馆的建设,在《一九四一年边区教育工作计划》中要求“加强民众教育馆工作,使成为社会文教工作的重要据点,尚未设立民众教育馆之县于今年全部成立。”根据政府的指示,各县市普遍建立民众教育馆,虽然设备简陋但功能完备。边区民众教育馆主要由农民自己的农教、青教等团体来主办,政府只是给予特定的人力物力的帮助以及政策的指导。民众教育馆通过建立特定的阅览室、办黑板报、读报组以及下乡巡回宣传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教育工作。如曲子县的民众教

育馆办得非常成功,它没有华丽的设备,但通过板报、社火等朴素的方式成为曲子县民众文化生活的核心,为民众获取抗战和生产信息提供了重要窗口。

冬学提倡农闲时抓教育,成为边区消灭文盲的关键措施。“天寒地冻把书念,花开水暖五庄农”是对冬学的真实描述。冬学的办学模式极其灵活,教育对象多以半文盲、文盲为主。办学时间主要集中在冬日农闲的时候,但可以根据农时灵活调整,在农忙时减少课程,农闲时增加课程。冬学中试用新文字对消灭文盲起了很大作用。为了避免冬学结束会降低民众对大生产运动的热情,边区政府规定在冬学的基础上推动民校的常态化运作。在冬学结束时由民校来承担民众教育的工作,实现冬学和民校的有效衔接,推动民众教育的良性循环。

夜校和识字组主要是针对成年民众白日忙于农作,没有时间学习的情况下成立的。夜校主要设立在人口集中的村庄和城市机关、部队、企业等处。采用“随学随教的办法”,由小学高年级协助教师教低年级学生识字、复习功课。这不仅解决了师资短缺的问题,还培养了学生的实践能力。识字组主要在乡村以家、邻居为单位编成小组,通过识字的人教,不识字的人学的互助模式进行教学。识字组的学习场所是不固定的,田间地头、院子小道都可成为课堂,学员在劳动休息时就可学习,在不耽误民众劳动的同时也教给了他们知识。

## 二、确立民众教育为抗战服务的导向

边区的政治教育始终围绕着抗战救国而展开。“教育是实现政治任务的工具。目前的政治任务,在于动员与组织全体民众,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克服困难,准备反攻,驱逐日寇出中国,争取我中华民族之彻底解放。”边区民众教育通过读报、办黑板报、表演戏剧和标语等

方式向群众宣传抗日纲领、抗日政策以及抗日发展变化的真实情况,揭露日军侵华的事实,增强民众民族意识,引导群众援助抗战。这种宣传在民众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曲子县群众在读到“敌人在山西省太原抓壮丁,运到太平洋上去替它打仗,你看这不是叫咱百姓送死去……”。激起了群众的愤慨之情,这就进一步坚定了群众支援抗战的积极性。

边区文化教育为抗战服务。“实施民族解放和民主政治为民众教育的中心内容。”边区文化教育主要以扫盲为目标,政府编写了《新文字课本》等贴近群众生活的通俗读物,吸引群众兴趣,教会群众识字。为了帮助群众更快捷的了解抗战信息,边区政府创新了许多灵活的方式,如通过农具等生活用品结合抗战故事创造特定情景,或者利用墙报、标语等方式宣传党的抗日政策,动员群众参与抗战。边区政府还积极动员所有群众参加教育工作,从学生中产生他们自己的领袖,从实际的工作中培养满足抗战需要的教育干部。

边区生产教育为抗战提供物质基础。生产教育作为边区民众教育的主要内容,始终承担着保障民生、支援抗战、推动边区经济发展的责任。农业是推动当时边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曲子县的民众教育馆充分发挥了读报组的作用,让读报的商人积极分子向群众介绍放羊合作社的模式,动员群众组织合作社,提高生产效率。此外,边区的生产教育还包括向群众讲解党的经济政策,帮助民众更好地理解主动参与到边区的经济建设中去,保障抗日战争的供给。

## 三、完善民众教育的保障机制

保障师资。开展民众教育,教师首先不可或缺。“在今天边区小学教师中,有百分之七十八是边区土生土长的。年龄都在二十岁左右,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新生一代的边区自己的青年知识分子了。”边区政府面对师资短缺

的情况,积极吸收旧知识分子,通过对这批知识分子的改造使他们适应新民主主义建设的需要。边区政府还通过开办讲习所、教师培训班等机构来培养能够担负民众教育重任的教师群体。边区也十分注重教学与实际相结合,动员机关部队任职人员授课,这有效避免了民众教育与边区实际相脱节的情况。

保障教育经费和教材。要想在边区开展好民众教育,经费和本土化教材是政府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边区政府大大提高了教育经费在财政中支出的比重,对民众实行免费教育,向贫困学生提供书籍、学习用品并在生活上给予帮助。边区重视社会力量的动员,呼吁社会各界支持边区民众教育的建设,1939年7月延安恢复民众教育馆,向社会发起援助“至于馆内各种书报杂志,除向机关方面设法解决外,尚希各界热心民教同志,慷慨捐助。”[《市政府恢复民教馆》,《新中华报》1939年07月28日,第3版。]边区也重视动员群众,乡村民众积极帮助边区开展教育,捐赠木材、粮食来保障教育得以开展。

保障教育资源整合。边区政府推动了边区民众教育的跨部门协同和军民联动,打破了教育与军事、经济等领域的壁垒,军队机关不仅开放军营内部的图书馆,还派人兼职任教,向民众讲授军事常识。军队还帮助乡村修建学校,为学校提供物资和劳动力的支持。农教会、妇教会等群体积极动员群众入学,组织文艺演出,编写适合民众阅读的书籍来支持民众教育。

陕甘宁边区民众教育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探索出的成功路径,不仅为抗战胜利与根据地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些经验也为新时代破解基层教育发展难题、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历史借鉴与现实指引。

作者单位:延安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